



温岭这个地方曾孤悬海外？

时有风吹/文



千年曙光碑。

孤悬海外？避乱之地？海盗巢穴
在（太平）县东南六十里海岛中，旧属黄岩之六十六都。国初以倭寇数犯境，徙其民腹里，遂墟其地。有西岙，后岙，茗岙，蒲屿，大小姑岭，杜岙，西砂，新岙，大岙，慈岙，大小田湾，磊石，大小茭陈，总曰石塘。东有青礁洋，大小塔，绿屿，钓碑，厘崎，洋崎。南有五百屿，石龟峰，礁头，竿屿，永屿，党屿，箬屿。西有鹿星，横子片屿，鸡齐，深竹，母珠，上童，下童。北有积谷佛坛三所，白望在台极南，而远达海外诸国。惟百屿最大，与石塘对峙。

这是明代《嘉靖太平县志》对石塘的叙述。可以看出，四五百年前石塘还是一座海上的岛屿，与周围的孤屿岛礁离散不一。那么最早的石塘是怎么样的，又是如何演变成现在的样子的？

到了明代，原来热闹非凡的石塘，开始走下坡路。
明朝初年，海上走私集团、地方豪强和逃避战火的民众，各种人群散布沿海岛屿，为将这群人控制在王权之内，明太祖下令将东南沿海岛屿迁徙一空。

当时台州的石塘山也在强迁之列，约前午迁者为民，午后迁者为军（中午之后迁的，就会被充军，成为世代翻不了身的军户），在惨无人道的迁移令下，岛上居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迁往异乡。

整个明代，石塘山没有政区设置，处于一种行政废弃状态。但在军事上，并不是弃而不守，为了防倭寇，官军在与松门卫城隔海相望的石塘山南端小交陈山顶设置了一个小高瞭台，观察海上往来船只动静。

明代中晚期，随着闽浙海上渔汛路线的形成，有追逐渔汛的福建渔民，开始到石塘山结棚搭寮居住。那时来到石塘山的福建渔民，只是一种季节性的、流动性的漂移，很少能在此定居。因为他们不是编户齐民，而是无籍之人，在岛上会被官府当成漳贼、倭寇围剿，他们是很难在石塘山繁衍生息形成渔村聚落的。

明末清初，郑成功率领南明军与清军在台州沿海展开拉锯战，战事漫长而激烈，太平县城、台州府城几度易手。石塘山也被郑成功军辟为山寨，长期盘踞。

为防沿海百姓接济郑成功，清廷颁发严酷的禁海令，将沿海居民主内迁几十里。当时不仅石塘山再度被弃，就是松门卫城的居民也被迁移一空。

清初的迁界禁海持续了二十多年，太平县沿海人口驱赶流散殆尽，石塘山当然也成荒芜海岛。

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郑氏政权归降，东南沿海的军事威胁解除，朝廷准许百姓迁回界内。虽然此时台州沿海已陆续复界，但石塘、玉环等孤悬海岛却没有立即复界。第二年（1684），朝廷又颁布了禁止民众赴外洋岛屿搭寮居住的命令，石塘山依旧属朝廷的封禁之地，不许百姓上岛居住。因为自明朝以来，台州近海岛屿常常成为福建人的聚集地和“贼盗”的据点，这被清廷视为纷乱的根源。

石塘山的开禁是在雍正年间（1722—1735）。自明朝初年被迁弃，一直孤悬海上的石塘山，终于设置了行政区划，属温州玉环厅。而对上岛垦荒的居民，官府有着严格的身份限制，一定要是太平、乐清两县籍贯的无过之人，并要求有族人、邻居的担保。至于上岛搭寮居住的福建人，一经发现，立即驱离。官府依旧对福建人成见甚深，限制他们落籍石塘山。

乾嘉（乾隆、嘉庆）时期，福建闽南地区的人口压力、自然灾害、民众反叛相继出现，饥民通过闽浙海路前往浙南沿海的人数激增，而当地官府却继续把他们视为贼盗，不给户籍，任凭他们成为海上流民。

闽南海上流民长期积压的不满，终于在乾嘉之交爆发，大量北上的闽南人开始投身海盗，占据台州大陈列岛，组成海盗大帮，造成了自平定台湾郑氏以来最为严重的海上危机。

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嘉庆元年（1796），石塘、沙镬、黄（横）门等14个离太平县较近的海岛，从温州玉环重新划归太平县管理，海防则由黄岩镇水师负责。

海盗大帮与清军水师整整相持了十几年，直到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终结了这些海盗帮派。嘉庆五年（1800）六月，盘踞大陈岛的凤尾帮，纠集闽盗水澳帮、土盗箬横帮、夷盗安南海匪，在准备攻打松门卫时遭遇强台风袭击，几百艘船、近万名海盗被风暴吞没。

清朝中叶的这次东南海上危机就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

随着海上匪患的平定，官府在石塘山重建汛哨，清查周边海岛居民，就地编甲。其实，这就是默许闽南人定居太平县周边岛屿，不再驱逐他们。闽南移民在光绪年间达到高潮，仅在石塘山定居的移民就超过千户。

在石塘山，来自闽南的移民往往以岙建立自己的家族式村落。岙，是海边港湾，地形表现为三面被山包围，一面向海敞开形成避风港。



航拍下的石塘滨海绿道。



七彩小岛小箬村。

石塘山的清代闽南移民，以陈姓居多，郭姓、庄姓次之，他们大多以讨海为生。

据说陈姓迁自福建惠安，主要居住在箬山的石仓岙、里箬、外箬等几个濒临的山岙中，他们与周边乡镇隔山隔海，形成了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单元。在这种封闭的区域环境里，他们以单一姓氏聚居成血缘村落，讲闽南方言，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他们不仅在生产生活上互助，而且为了抵御海匪袭扰，在安全上也是集体防卫。

郭姓也迁自福建惠安，据说还是出自泉州百奇郭氏。

庄姓迁自泉州，迁入时一度定居龙门铜门，之后散居于钓浜、石塘。

在石塘山，台州本地的移民存在感极低，他们的人数很少，以前主要从事手工业和商业。

温岭县沿海的宗族坞堡武装，有其地缘生存背景。它主要存在于石塘、箬山等濒临的山岙之中。这里居住的人群，主要是从闽南迁移而来，这些宗族坞堡武装是有别于地方民团的，它们的武力并不在区团或县政府的掌控之下。有一个事例，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1931年3月，温岭县长唐梗献视察南区的石塘镇、箬山镇。当他在松门保卫团的护卫下从上马乡翻山走到牛栏岗时，被人拦住了，并被告知，需先遣人至石仓岙村、里箬村进行通告，才能通行。因为石仓岙村的自卫能力很强，外来部队经过如不先行通告，必被疑为匪徒，村中武装会占据险要地势，开枪阻击。

民国时期的石塘为渔港，有各类渔船四五百艘，约有居民千余户，街市较箬山繁盛。

当时与石塘山一水之隔的甲礁（钓浜）隔海山有海匪巢穴，聚集于此的海匪不下百十来人，他们以此为根据地，劫夺洋面过往船只的财物，甚至上岸赴石塘、松门一带绑掠人口。

温岭县一些商船和渔船为了自保，均携带武器上船。而少数渔船携枪，却是以自保之名，在海上行抢劫之实。渔汛不利的贫苦渔民私持枪械，对其他船只进行抢劫。《申报》就曾报道过：渔汛时期，渔船均带衣粮、银洋，故有些渔民会趁此时掠夺，增加额外收入。这类渔民其日常生活为半渔半匪，一旦行劫事迹暴露，就会彻底加入海匪团伙。

温岭沿海地区枪支的泛滥和石塘山坞堡武装的出现，是源于民国政府并不禁枪，民间持枪自由。据温岭县政府1931年至1933年在清乡期间统计，全县有合法枪械7771支，民间拥枪比例竟然高达1.72%，每百人中差不多有两人拥枪。这是温岭在那个混乱年代的真实社会状态。

据民国《温岭县政概况》介绍：县内渔民十九贫乏，每逢渔船起季，所有需用均向渔行借取，名曰“船头金”，利息甚重。所有用船头金之渔户，其捕得之鱼须归发船头金之渔船经手贩卖，渔船复从中扣取佣金，渔船无渔行则不能得资起季。渔船无渔户则无鱼出卖。其相互关系甚大，惟渔户辛苦所得，被渔船重叠剥取。

当时石塘山的渔民出海，多为木制帆船，易遭风暴袭击，船毁人亡。又加上海匪抢劫勒索，渔船获物遭层层盘剥，收入无几。受雇渔民，收入更微。

出海渔民除供食外，每日只能得到0.16元报酬，终年劳累。全家不得温饱。遇到歉年，过着吃的卤汁汤，穿的破衣裳，家里爹娘泪汪汪的悲惨生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石塘消灭渔行剥削，渔民实现互助合作，置船添网，改进捕鱼技术，渔业生产迅速发展，渔民生活稳步上升。

2000年1月1日清晨，石塘成为新千年中国大陆第一缕曙光首照地。为了让这千年一刻变成永恒的纪念，石塘兴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千年曙光碑。

进入新世纪之后，石塘又大力发展旅游业。石塘碧海怀抱，风光秀丽，绵延纡曲数十里，因常年受台风暴雨侵蚀，荒岩裸露，绝少平地。其景观以融合人工之巧和人工之妙的特色闻名遐迩，被人们誉为“东方的巴黎圣母院”和“画家的摇篮”。

今天的石塘已然由一个不起眼的小渔镇变成了网红打卡之地，环岛建起了滨海绿道和观景平台，而两边就是碧海蓝天和苍翠的山岭，还有沙滩、礁石以及繁忙的渔港，这一切正不断地见证着渔镇的繁华和沧桑。

石塘镇箬山渔港。



本版图片由记者徐伟杰摄